

档案事业建设与社会发展丛书

陈智为 主编

档案文化论

王英玮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档案事业建设与社会发展丛书

陈智为 主编

档案文化论

王英玮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档案文化论/王英玮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2

(档案事业建设与社会发展丛书/陈智为主编)

ISBN 7-300-02655-9/G·435

I. 档…

Ⅱ. 王…

Ⅲ. 档案学-文化-研究

IV. G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8847 号

档案事业建设与社会发展丛书

陈智为 主编

档案文化论

王英玮 主编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丰台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 2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2 000

定价:1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档案与人类社会的原始文明	19
第一节 档案文明的诞生	19
第二节 记号时期的社会文化明珠——河图、 洛书	25
第三节 画字、绘画——记录古代社会文明的 工具	28
第四节 卦画——古代的数字记录档案	31
第二章 档案与阶级社会的文明	34
第一节 文字之兴与档案文明	34
第二节 历法档案文化	38
第三节 夏王朝时期的档案文明	40
第四节 商代的档案文明	44
第五节 周代的档案文明	51
第三章 档案的社会文化本质	60
第一节 档案的存在本质及其社会性质	60
第二节 档案的内容本质及其社会性质	68
第三节 档案的历史本质及其属性	72
第四节 档案文明的社会地位	76

第四章 档案文化价值	80
第一节 档案文化价值概念及其研究的社会意义	80
第二节 档案文化价值理论体系	86
第三节 档案价值商品论评析	102
第四节 其他档案文化价值理论述评	107
第五章 档案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全宗理论与来源原则	115
第一节 来源原则的历史发展阶段	116
第二节 以来源原则为核心的全宗理论	130
第三节 传统来源原则与“新来源观”的关系	151
第四节 全宗理论研究的取向	153
第六章 档案馆的社会文化性	155
第一节 档案馆社会文化性的表现	155
第二节 档案馆社会文化性的演变	161
第三节 档案馆社会文化性的强化	167
第七章 档案馆社会文化功能的实现	176
第一节 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	176
第二节 档案馆社会文化功能实现的条件	187
第三节 档案馆社会文化功能实现的途径	191
第八章 企业档案与企业文化	200
第一节 企业文化的形成与企业档案	202
第二节 企业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0

第三节 企业档案与企业文化的构建·····	218
第九章 档案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32
第一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含义·····	233
第二节 档案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236
第三节 档案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 用与途径·····	247
第十章 档案学自身的文化建设·····	265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与评价·····	265
第二节 档案学文化建设的规律·····	284
第三节 档案学文化建设的方法·····	303
后 记·····	315

导 论

文化，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通常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①。关于文化的定义，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较为传统的定义，是英国的爱德华·泰勒所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化是一种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规、习俗以及所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美国的克罗伯和克鲁克洪在分析了一百六十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之后，提出了他们的观点：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工造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致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携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档案文化是很有帮助的。

档案文化是人类社会各种组织和社会成员，通过有意识的创造性劳动，逐步积累和保存下来的维系和促进人类历史文明延续和发展的物质与精神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档案是

^① 《辞海》，1版，3510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文明的产物、文化的源泉，是人类遗产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档案中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成果，这些知识和经验使得人类社会走向文明。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而档案文化的发展是文化发展连续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档案属于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档案既反映了上层建筑观念形态，又反映了经济基础物质成果中凝聚的精神价值”^①。

档案的文化属性主要表现在：档案文化不是通过孤立的研究而形成、管理与提供利用的，而是把档案与档案事业和人类的社会活动密切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档案文化包含了人类社会、民族的特殊标志和特殊成果，包括知识、信息、信仰、道德、法规、习俗等智力的、审美的、技术的和精神的成果。档案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档案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以各种方式和载体将人类的历史活动过程和思想认识成果记录下来，并使之流传后世。档案是人们智力活动的产物，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是它不只反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也反映了社会的物质文明。档案既记录了人们物质生产发展的过程，又记录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进步状况，还记录了社会制度的改造和进步的情况。档案是社会进展文明的记录与标志，它对社会发展与建设，具有宝贵价值。

其次，档案管理方式、手段与设备，凝聚着人们关心与认识档案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念。从微观来看，档案文体的形成是经过档案工作人员通过有效的、科学的筛选活动，从庞

^① 陈智为：《档案社会学概论》，1版，1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杂的文件中选择出来,成为日后记载和传播人类文明的媒介,可以说,档案的个体是人类有效劳动的创造物,即文化创造物。档案的文化特点还表现在人们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以及人际关系所作的认识了解的总和,在档案中,既可以了解人们工作、活动经验的总结,也包括对这种经验上升的形态即科学形态的概括。从宏观上来看,就档案的群体而言,其存在与发展,不仅取决于各种文件形成者的有效劳动、经验、知识的创造,而且取决于档案工作者的辛劳与奉献。无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档案工作人员创造性的劳动,才能使现实文件转化为档案,档案工作人员才是档案文化价值大厦的缔造者之一。档案是一种社会的文化存在物,它能以何种方式存在多长时间,都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相适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对现实社会需求的调查,通过对未来社会需要的科学预测,档案工作者完全有能力把握时代的脉搏,洞悉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对档案信息的利用需要,从而将那些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档案,挑选并留存给子孙后代。

档案的文化价值主要是指档案作为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以及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变革与进步所具有的各种有用性、效益性。当代档案工作者,在从事档案管理活动中,通过档案馆(室)管理技术的掌握与运用,充分发挥档案装具与设备的功能,探索不断完善和丰富对档案文化价值的知识内容,充分显示出人们对档案文化价值的认识程度,通过档案管理活动中物质形态体现出来的精神活动,进一步展示档案的文化价值。

再次,档案工作活动已纳入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轨道。就档案本身来说,档案是一种智力产品,属于精神生产的范畴,档案具有传播知识的功能,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被誉为“历史文明之母”。档案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和表现,而

且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与作用。简言之,档案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其一,档案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同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之间是从属关系;即档案信息开发服务于精神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依据、注入活力。

其二,档案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是一种依存关系。档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没有档案,精神文明建设无法在历史的史册上留下记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丰功伟绩,是依赖于档案的见证。

其三,档案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一种补充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世界文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全部活动中新产生的档案必将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最辉煌灿烂的组成部分之一,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其四,档案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档案是人类记忆、文化、文明的金子。保存与利用档案,就是保存与利用人类的智慧。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高,社会对它的利用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强烈。

其五,档案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是一种传承关系。我国具有重视档案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现在及未来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是由于我国有着极其丰富的馆藏档案,有着重视档案事业的优良传统,才使得民族文化世代传承,才使得中国文明至今乃至将来都保持着很强的凝聚力,也使得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

从档案到优良传统,从民族凝聚力到精神文明健康发展,一环扣一环地转换着。

档案文化结构的核心是档案观念。它主要包括档案管理

活动的历史传统、档案价值和档案意识。档案观念是档案文化的深层结构，有时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又不能直接揭示它。

档案活动的历史传统，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档案活动的观念，它仍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今天档案活动的原则与方法，这在中国档案史与世界档案史等有关著作中，均有系统而深入的阐述。

档案价值是档案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引导人们从事档案管理活动指引方向提供步骤，思考着档案管理活动的动机与效果。档案价值观，是人们对档案的存在价值和利用价值的总的看法和理解，是人们通过相关的具体的档案价值知识的概括、总结形成的关于档案存在意义的总观点。研究档案的价值，有助于树立科学的档案价值观，有助于我们拓展视野，促进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助于巩固和提高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有助于加强档案业务建设，更有助于拓宽与发展档案学的研究领域。

档案意识是档案和档案工作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总和。亦即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这一客观事物的反映和认识，是社会对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和反映程度的整体观念。档案意识，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从社会的无意识到档案意识的萌芽，并逐步加深，使人们真正了解档案的社会意义，并且自觉地运用档案资源去改造社会。

档案从产生之日起，即被少数人垄断，档案被视为“插入鞘中的剑”，档案工作领域被视为禁区。我国即使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的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仍然是“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一字者”，一般平民百姓，甚至中、下层官员都接触不到或很少接触到档案，还侈谈什么档案意识？真正对档

案有所认识、对档案工作有所了解，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公布与实施之后；档案法从法律角度，向社会公众提出了认识与理解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课题。由于它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关于国家管理档案的一项重要法律，所以每个社会组织、机关单位乃至普通公民，都必须受其制约并依法履行权利与义务。目前，我国社会档案意识还比较薄弱，应采取多种措施，强化人们的档案意识，提高人们对档案工作的认识，引起全社会对档案工作的重视，尽一切力量做好档案工作，以保证档案与档案工作在推动国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档案文化结构外在表现形式是档案的行为方式、行为成果以及有关的手段与结构。行为方式包括形成档案的行为，存储档案的行为，利用档案的行为以及研究档案的行为。这些行为把档案从无序状态转化为有序状态，从一个低层次提高到一个较高层次，从而形成了对档案现象某种新的认识，这是一个形成与开发档案的过程，也是造就工作与科研成果的文化活动过程。人们的档案行为成果，是档案行为方式的产物，它可以分为档案形成阶段成果，档案利用阶段成果以及档案研究开发阶段成果。这些成果具体反映了人们对档案现象认识的新发展，也为人类进一步从事档案工作活动创造了条件。档案符号系统是传播档案信息的表现形式。档案只有依赖于符号系统凝聚、积累和传递，其特点才能被表现出来，并得到延续。文化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它不是零碎的、瞬现即逝的画面，而是一种社会沉积，一种深厚的符号积累。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包围人的是符号的世界。从作为文化的前提的语言开始，到他与同伴的符号关系、社会地位、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与无数其

他事物,人的行为除了饥饿与性的生物需要等基本方向之外,都由符号的实体支配。”^①可见,符号系统可以成为人类文明的记录手段,是构成档案文化特征的外部表现。

档案的文化表现,主要是通过档案与档案工作可以延伸记忆、延续人类历史、延续人类文化和延续科学技术。以下分别论述。

第一,延伸记忆。

众所周知,人作为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可以借助语言符号交流思想、积累知识与经验。但人的大脑也有一定局限性,人的记忆会出现淡忘甚至于错误的毛病,而且人脑记忆会随着人的死亡而不复存在。即使通过一定的表达手段,传至他人,其准确性也是大可怀疑的。因此人脑记忆与社会发展关于知识信息的积累与传递之间存在种种矛盾。

档案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明产物。远古时代的人,只能靠语言和动作表达思想,凭记忆贮存信息。但是,语言、声音的传达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极大限制,不能直接通达远处,无法贮存备用,更难以留传后人。为了克服上述缺点,人们创造了“结绳记事”和“刻木为契”等记事方法,它标志着人类已经着手建立反映自己活动的、不依赖于人脑的独立记忆系统,无论它的记录符号采取什么形式,都意味着人类有一定的辅助记忆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结绳和刻契是档案的前身。从档案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其每个发展阶段也是以增强人类的记忆功能为核心的。文字的发明,为档案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使档案记忆功能更为普及和

^① 转引自沙莲香主编:《传播学》,1版,6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流传,文字的出现又为文书记录提供了工具。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继续和发展,需要人们贮存有价值的文字信息,以资查考和充作凭证,因而保存起来的文书则成为档案。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早的文字信息记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恰恰反映了档案的文化特征。

国家档案工作体制的出现,使档案记忆系统成为社会专职的机构,人们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档案记忆功能为人类服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档案记忆的范围与存储、利用手段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使之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档案的出现就是为了强化社会和强化人的记忆功能,保证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联系性。

总之,通过档案将人类的实践活动直接地、真实地记录下来,为人类的认识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提供比较权威的凭证材料与可靠的参考对象,从而增强社会的记忆体系,提高人的认识和能力,使人类充分利用和合理组织文化遗产,创造更多更新的人类文化。

第二,延续人类历史。

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档案形成于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于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个方面。它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观点。档案中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的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并且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没有史料是不行的。没有历史事实就谈不上进行历史研究。而在所有史料中最系统最完整而又比较可靠的就是档案。档案的史料价值一般超过图书,这是由于档案上面的记载,能客观地反映出历史事件比较原始的

状况。问题的前因后果和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能程度不同地予以揭示。即使是同一问题或同一事件的档案，由于档案形成者的复杂性，在记载上可能是互相矛盾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而这些出入与矛盾，恰恰是历史学家需要研究与思考的问题。

对历史事件如此，对历史人物评价更是如此。《清实录》列举了清朝雍正皇帝近臣年羹尧的92项大罪，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研究了有关年羹尧的各种档案就会发现：历史正在每隔几百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以不同形态重演。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凡是功勋卓著、达到威胁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边缘人物的下场，一般都是悲剧式的。从西汉、明初，到清雍正时期都屡杀功臣，正是这种规律在起作用。与年羹尧有关的档案，分散在全国各处的约有八百多件，通过对这些档案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雍正皇帝与大臣年羹尧的关系，实质是一个权力之争，是君权与臣权的矛盾冲突问题。雍正即位不久，感到年羹尧是前朝（康熙）的老臣，权位极高，一时奈何不得，便极尽拉拢、笼络之能事，并指使年羹尧监视、迫害自己的弟弟——允祀，牵制其弟弟的兵权。雍正上台不久，在年羹尧奏折上的“奏批”，密密麻麻写了许多肉麻的话：朕假如负了你，我就是天下最负心的人了。这是麻痹年羹尧，一旦时机成熟就收拾他。不过几个月，年羹尧就从位极权臣成了雍正的阶下囚。这些事实，在史书上是找不到的，而通过各个角度形成的档案，是可以得出正确结论的。

中国的历史，为什么有不少情况不依历史事实而随意编写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史书大都出于官修，要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即使私人修撰的专史，也有不少是假话连篇，说了真话的都没有好下场。有的送掉性命，有的即使死了，也

被开棺戮尸，久而久之，历史仿佛果然是个乡下姑娘，你爱怎样打扮就怎样打扮她。这也是档案史料价值要超过一般史书的原因。

然而，档案也并非十全十美，它也有虚假性与片面性。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四人帮”诬蔑刘少奇同志是工贼、叛徒，甚至还公布过一批“材料”，后来查明这些所谓“材料”都是伪证，没有一个是真的。现代如此，历史上也不乏其例。在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中，有一条规律：凡是要按人口来收钱，人口必有浮夸。这些都是农民对抗官府的一种手段。因而，对每份档案的情节、数字，既相信也怀疑，应尽量搞准确些，以免走弯路。既要用档案来考证图书、订正图书，也要用图书来订正档案不准确、不全面的地方。

档案史料是编史修志的重要依据，收藏档案，编修史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收藏档案与编修史志大都是由史官统一掌管。由于他们直接掌握档案，对史料熟悉，所以编修史志方便，成果丰富。从我国秦以前的一些史籍来看，这一时期的编史与档案工作很难划出一条界限，“书事记言”和“删定成册”多是出自同一职官之手，古老的“史籍”实际多是档案文件的汇编。比如《尚书》，尽管其中不少篇章是后人所伪造，但也有不少是档案的选录。孔子据百国宝书（档案）而作《春秋》，这部书实际上就是鲁国的文件汇编；《左传》、《国语》也是类似的书。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两部巨著，编修时都大量利用了档案史料。司马迁在西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在写作《史记》过程中，他充分利用接触和管理档案文件的有利条件，参阅了大量档案与古籍，“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毫不夸张的。东汉的班固当过兰台令史（相当于现今的档案馆长），因而得以“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

后来各朝的“官修正史”，利用档案的情况就更为普遍了。至于近、现代研究历史，编史修志更是离不开档案。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著名文章《州县请立志科议》，主张州、县应设立一个“志科”（类似现代的档案馆）收集与管理档案，积累到一定程度，用以编修地方志。由于历史的局限，章学诚这个合理主张当时并没有实现。尽管如此，中国历代都有编纂史书的传统，往往是前一个王朝被推翻以后，后一个王朝就组织力量编纂前朝史书，几乎每个朝代都是这样，这是一个好传统。省、府、州县一般也是三十年左右编修一次地方志。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省、府、州、县，充分利用档案编史修志，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优良传统。

档案与史志之间虽然关系十分密切，但是两者又有区别。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史志是历史的系统记载，档案是印证史志的可靠保证，没有档案，史志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馆藏档案只有被广泛利用，被用来编史修志，它的社会作用、珍贵性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档案编修成史志，可以流传百世，可以使档案的社会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或内部发行或公开出售，部门与个人都可以购买收藏，既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史学界广泛利用档案的需要，又能使档案得以长期保存。档案编成史书以后，一般都不必使用原件，档案少受磨损，便于长久保存，而且档案编成史志书籍以后，散藏于社会，不论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总有一部分得以保存下来，流传后世。我国明代前的档案原件，目前尽管所剩无几，但那时利用档案修成的许多史书至今仍广为流传，这是古人利用档案进行文献编纂的一大功绩。修史修志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存档案，延长档案寿命，延续历史，提供史料为社会服务的作用。

档案是编修地方志的主要资料来源。我国历史上有编纂